

老篾匠们手工编织的竹背篓总是经久耐用,可以用上一两年,底部的主篾条磨损了,换上新的后又能继续用上好长一段时间。背篓和镰刀、锄头等农具一样,是山村人一辈子都离不开的家伙什儿。用久了的背篓和久用它的人一样,都有了生命夸张的弧度。

我没见过奶奶,她在父亲比现在的我还小几岁的时候就去世了。据说是因为过度劳累。不过也有传闻说是被人害死的。奶奶身子本来就弱,生下父亲这第五个孩子(前几个都是女儿)后就更是日渐消瘦。那时还实行集体劳动,奶奶因为身子弱就要求少背一点粪肥,可气的是,带队的那人非但不答应,还用锄头使劲往背篓上压了压,甚至还骂了些不好听的话。奶奶还了几句嘴,谁知那人竟在奶奶背着背篓准备走开的时候故意推了一把,奶奶摔倒了,吐了几口血昏倒在地,后来治了几个月始终没有起色。奶奶就这般轻易地结束了苦重的劳累,谁也想不到是这样的结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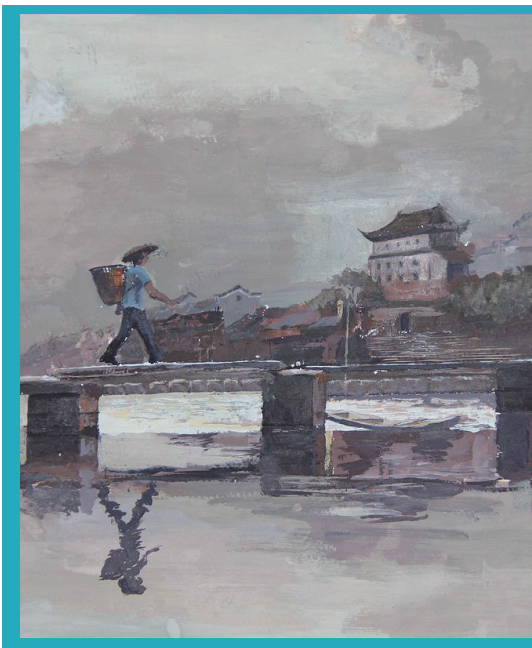
听母亲说,父亲曾对她讲,奶奶病重的时候身体很消瘦,本就不多的皮肉到后来就只剩下了皮包骨,而且脊背也弯曲的厉害,好像短短的时间内奶奶衰老了,除了较少的皱纹和头上的青丝,已然成了农村老人惯有的模样:弯腰驼背,佝偻委顿,面色沉重。而奶奶那时才40多岁而已,生命的活力已透支完结。我不曾想过人受过的苦累、遭受的伤痛竟会在人最脆弱的时候凶猛地爆发。

推奶奶的人于我们家来说自然是凶手,那背篓也被定义为凶物。但那人当时只是被拘了几天,赔了一笔钱。作为凶物的背篓仍被人使用着,丝毫不为人们所介意。

奶奶的事情让我对背篓有了一种不安的揣测,认为它代表的体力劳动会剥夺走人的生命,所以庄稼人总是衰老得那么快。那高高拱起的脊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每一个上了年纪的庄稼人,都逃不开背环无数个背篓的惩罚,接触背篓的脊背,变得和背篓弯曲的凹痕一样。我想,每一个老人都保持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姿势,注视他们已经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土地,弯下的弧度越大,意味着离泥土也越近,近得能够嗅到死亡那寂静衰朽的味道。

山村少年始终是要背上背篓的。区别只在于背上它时的年纪,背的时间和不再背它要用什么方式,那过程需要多久。

我和背篓的联系是血脉里自带的,是生活环境所规定的。我的背注定要接触那些编织得精巧



笔 莹

背篓深处,背的弧度

也许,背和背篓的弧度是相互造就的,都是生命曾经蓬勃后的痕迹。生活的重量不是抛开而是接住,尽管它是一种生命意义上的消磨……

的背篓,把原本笔直的篾条在一次次接触后压弯。不管是在物理性质还是实际接触上,我的肩背都比篾条更硬。

父母和爷爷不和,闹得分了家。家产没什么可分,更何况爷爷是那么霸道吝啬,连公证人也不愿意为父母说话而得罪他。父母分到的就只有几亩偏远贫瘠还多石块的山地,一件破旧的家具和一笔少得可怜的成家费。据父母讲述,刚分家的那段日子真是苦极了,没日没夜地侍弄那几块地皮,也只是广种薄收,虽说有点收成,但生活上却不见起色。母亲说,直到我和姐姐都长大些,才算松了一口气。所谓的长大了些,是姐姐十来岁,我六七岁。也就是从那时起,我就背上背篓了,尽管那背篓的象征意义比实际用途更多些。背着小背篓的我显然不可能帮上父母什么忙,甚至时常使性子耍脾气帮倒忙。但母亲说她的确轻松多了,看着我们背着背篓跟在身后,就好似我们承担了她肩上背篓的重量。

待再长大些,我就真正地背上背篓了。背篓里什么都装,和大人们一样用背篓背回地里的庄稼,背够烧火的木柴,背那些铺路的石子和肥地的粪料。有时,背篓也是大人们为孩子发明的摇篮,到地里干活时把孩子往背篓里一放,或是赶路时背

上就出发了。

我的肩膀比一般人的更宽些,我想这是曾经长久地背过背篓的缘故。背篓像蜗牛的壳一样长在了人的身上,人们既需要它,又渴望摆脱它。这样一个负担,成为我生命重量的一部分。秋收会使人快乐,但却不会是秋收的那一刻,那时人的精力只会用在支使疲软酸痛的四肢上,来不及思考其他,至多,更为丰盛的收获只是让人能够在繁重的劳作中支撑更久罢了。我对秋收的记忆并不美好,燥烈、热汗、折磨、沉重这几个词混合在一起就是我对所有的印象。地里种的各种豆类杂粮在夏末就已收获了,秋天收的是玉米,这也是一年中 busiest 的时候。玉米的分量可是不轻,更何况要用背篓背着它走不短的山路,流汗、晒黑、手脚磨出了茧也都寻常。我第一次承担与大人背的分量是在在上完初中那年。在农村,十五六岁的少年是可以顶门立户的大人了,就算父母心疼我不让背满满一口袋的玉米,我自己也会生出羞耻感,非要背不可。

几趟下来我就不行了,被其他人远远甩在身后。秋天的太阳虽不如夏日那般猛烈,可也有几分毒辣,晒得人浑身使不上力气,嗓子冒烟,喝过水之后四肢反而更软了。追不上,我也不走了,把



苏敏

给石头和山取名字

山顶的那方湖水还在,只是日渐萎缩。它静静地荡漾在山顶,被风吹起一道道波纹,犹如父亲铺纸挥毫时的墨汁,抑或悄无声息地滋养着我们这些教室里佯装读书的孩子。

骑马石

我们村里有的是石头。家中盖房子的时候,打地基的石头便是从山上取回来的。还有我家门口的石壁、门槛石、磨刀石、猪圈里的猪食槽、磨坊里的石磨,立在村头的石杆、我们玩耍的石子,以及坟头的那些石碑,都是从山上寻回来的。

我对这些石头不感兴趣。它们长的样子都不太好。可是,后山上有一块石头不一样。后山严格说来不算个名字,它之所以叫后山,只是因为它位于村子的后面。

在我们村,出门便是山,转身也是山,向左是山,往右还是山。你要问我是哪里人,最好的回答便是,我是山里人。如果把我们的村子当做一把椅子,后山便是那把椅子的靠背,村庄累了,便倚着后山靠一会儿;如果把我们村子当成一张床,那么后山便是那张床的床板,村庄要是乏了,便躺床上睡一觉歇息,第二天便又精神十足,一身的力气。这一睡,说不定还能睡出一大堆放牛娃来,我是,黑牛也是,桃子也是,邻家姑娘也一定是。

后山之巅有一块巨石,远远望去,就像是一匹马。我们村里,养过牛,养过羊,养过猪,就是没养过马。什么是马呢?马有没有脚呢?我问父亲。父亲说,马长着四只脚。我跟父亲说,牛不也是四只脚吗?父亲笑着说,马可不一样,它可以飞。那马是不是长着翅膀呢?父亲没有回答我,只说,马是草原上的一种动物。切,我们这里不到处都长着草吗?父亲说,草原哪里像我们这。我说,草原是什么样?父亲说,天苍苍,野茫茫,风吹草低见牛羊。我说还是没有马嘛。父亲又说,草原啊,绿草如茵,一望无垠,一马平川。我不懂。

我经常爬到后山的这块石头上,它高高地耸立在后山顶上,我将它当成是我们村里的马。我从树枝上掰下一根树枝,或者从竹子上掰下一根竹枝,把树枝或竹枝当成是马鞭。我将马鞭不断地抽打在巨石后面,马鞭“噼啪啪”作响。我一边挥动马鞭,一边“驾,驾,驾,吁,吁,吁”地大喊大叫起来。

见我玩得如此高兴,我们村里的风又跑了过来。它好像跟我说,我带你去过乳房山,你也带我骑一回马,好不好?你不知道,那一刻我是多么得意。风跟着我,它掀

起我的衣衫,撩起我的头发,跟着我一起狂奔。云也跑过来,一朵朵流淌开来,它有时跑在我的前面,有时又跟在我的后面。我似乎看到马的四只蹄腾空,跃起,在云雾里飞翔。坐在马背上,我看见了草原,看见了湖泊,看见了大海,看见那些地方闪烁着万道霞光。

这块石头是飞来的吗?是像黄山的那块飞来石一样由铁拐李腾云驾雾搬来的吗?假如是的话,我们村里谁是那聪明伶俐惹人怜惜的小娇呢?是不是那邻家姑娘呢?可是她的父亲不是石匠吗。后山上的那些猴子、兔子、山羊,它们是不是从这块石头里蹦出来的呢?我想起这些的时候,村里的风就偷偷躲了起来。我以为,我们村子里的风,走南闯北,东游西逛,它一定知道这些秘密。可是,谁知道,我们村里的风就是干不了大事,你瞧瞧,当我有疑问的时候,它便躲起来,不见了。

村里有很多人不见了,有人去了镇上,有人去了城里,有人去了合肥,有人去了常州,有人去了温州,有人去了广州……他们是不是骑着这匹马走的呢?

如果这样,我可不可以给后山取一个名字,比如叫骑马石。它多么像一匹马,载着那么多人去了那么多地方,可转念一想,我又后悔了,有的一去不见了踪影,有的跑着跑着便折了一条腿,断了一只胳膊,还有的丢了性命,变成一捧骨灰。若是这样,这是不是皆要怪罪于这块石头?村庄里,那些老头子一个个蹒跚臃肿,须发雪白,脸上刻满沟壑,他们呆呆地坐在村口,半晌不说一句话。他们是否骑过骑马石,这匹马为何不将他们一起带去远方呢?

村庄外的人,到哪里找一个后山这样的“靠背”与“床板”歇息呢?

笔架山

烧纸钱的时候,文榜叔在一旁叹息,说咱们村出不了有钱人。我也叹了一口气。是啊,村里祠堂年久失修,快要倒了,没钱买修祠堂的水泥和砖瓦。我长叹一声,文榜叔又得意地笑了起来,他说,我们村能出读书人。

出读书人?

他顺手指向乳房山,说,你看,它像什么?

说实话,我爬过骑马石,在梦里无数次抚摸过乳房山,却从来没有仔细地端详过文榜叔手指着的这座山。我去这座山上放过牛,砍过柴,挖过地,捡过蘑菇,收过麦子,拔过猪草,可我却从来没有认真地看过它。它长得有些凌乱,不太成气候,远远望去,三个山头并排着,山间沟壑纵横,树木参差不齐,乱石犬牙交错,连一条像样的山路都没有。

我总以为,我们村子里的这些河流不成气候,缺少大江东去的气概,没有浩浩荡荡的磅礴,而这都要归咎于这座山。它们瑟瑟地蜷缩着,像是犯了错似的;它们挨得那么近,你挤着我,我挤着你,生怕其中的一个山头有了出头之日,你不服气我,我不服气你。

山头的背后有一个湖。准确地讲,不能称之为湖,只不过是比普通池塘大一点的池塘。我姑姑家就坐落在那座池塘边。高高的山顶上,荡漾的湖水犹如一面明镜,映着蓝天白云,可它就是映不着我们村子,映不着村子里的女人。我想,如果这座湖泊落在我们村里,我一定会脱光衣服潜藏在水中,我知道,村里的女人们总是会去水边洗菜洗衣服的,邻家姑娘还会去水边解开她的麻花辫子洗头。等她们坐在湖边,我便蹭地一下,从湖里钻出来。然后,冲着她们大笑。可是,它在高高的山顶背后,并不完全属于我们村。

据说,这湖里有人跳下去再也爬不上来。我不知道,他们为什么跳下去,是湖水寂寞找人做伴吗?传闻这湖里有湖怪,三头六臂,浑身长着长长的毛发,还有一大双大的鳍。只要它一出来,湖面上便会掀起滔天巨浪。我一直想见识一下滔天巨浪的样子。人们还说,每隔一段时间,湖怪便会出来吃人,而且,只吃童男童女。这么一说,我又吓得浑身颤抖,裤裆里叮当作响。

我远远地望着这座山,想起很多往事,以及有关湖怪的传说。我反复咀嚼着文榜叔说的“我们村出读书人”那句话。突然,我眼前一亮。是啊,它就不像一个笔架吗?那座山的三个山头之间凹陷下去的地方,不就是笔架上放笔的地方吗?广州有笔架山,辽宁有笔架山,我们村不也有笔架山吗?

父亲算是村里墨水喝得最多的人,若是碰上有人要写个地契、请帖或者对联,

父亲总会被乡亲们客客气气地请过去。乡亲们请父亲的时候,父亲便不紧不慢地从他的书桌上拿起笔墨纸砚,然后,挺直他那被粪桶和柴火压弯的腰杆,踱着方步走出去。我至今觉得,父亲只有在拿起他的笔墨纸砚时,腰杆才是直的。这些年,他被我治病欠下的债务已经压得喘不过气来。

母亲整天劳作,有时候累得直不起腰。我无数次听她说过,只要你念书,我们再苦再累也值得。母亲是个农家妇女,她不会说读书这样的话,她说是念书。可我觉得念书没什么意思。在学校里,我总是逃学,旷课,同别人打架,去偷园里的桔子,碰上学校旁边有放电影的,便翻爬院墙,除此之外,我还把心思放在那些长得好看的女同学身上,我喜欢看她们那飘逸的乌黑长发与鼓囊囊的前胸。初中毕业后,我读了师范,整日游荡、打球、玩音乐,写一些谁也不愿看的文字,从不将读书当回事儿。

我们的祖辈父辈,整日劳作在这座山下。他们风里来,雨里去,从泥土里刨一口食吃,这些谷物,耗尽了他们一辈子绵长而又短暂的光阴。沉重的劳作,磨平了他们的骨骼和肩膀,压弯了他们的腰身。如果说他们的岁月是一部书的话,这部书一定是由苦难、劳累、饥饿、贫穷等关键词串联而成,倘若撰写出来,那一定是一部血与泪凝结的史诗。可是,他们的传奇与故事,又有谁帮他们记录和编纂呢?

山顶的那方湖水还在,只是日渐萎缩。它静静地荡漾在山顶,被风吹起一道道波纹,犹如父亲铺纸挥毫时的墨汁,抑或悄无声息地滋养着我们这些在教室里佯装读书的孩子。

我算不算是一个读书人?我觉得不是。麻雀奶奶家的儿子叫成龙,他家正对着笔架山。只要一开门,这山便耸立在她家的门口。她家祖上几代没有一个读书的。成龙的父亲有一身好力气,耕田,耙地,砍柴,挑担,绝对是一把好手。他们是不是也像我的母亲一样,对成龙说,只要你念书,我们再苦再累也值得呢?

那天,路过他家,成龙正好站在门口。我说,成龙,你站在那里做什么?成龙有些羞涩,压低着嗓子说,我在上海读研究生。哦,他可是我们村第一个研究生啊!

苏诗布

草与药(节选)



翻开《诗经》,读到蒹时,眼里就是那把益母草,那把挂在窗台下面,在风里微微晃着的益母草,有益母草在,母亲就在。

蒹

先秦时,益母草的名字并不叫益母草,而叫做蒹。它们本是同根而生,有一种特别的药性贮藏其间。

一把益母草挂在老房子的窗前,早已经被风干,失去了益母草原来的颜色。

往回细数着日子,母亲走了好些年了。

那把草是不是母亲挂在那里的?也许母亲也忘了,她曾经还挂了把益母草在窗下,她还能回来吗,还能回到那个窗前吗?

一把小凳子,一位老人,一口窗子,母亲老是坐在窗下面等,等我们回家。

那个家初看起来很简单。但现在想起来,却很富有。

母亲走了,按着自然的走向,她走的不是太突然,留是留不住的,每个人都得走向那里,只是母亲忘了那把益母草……

院子外面,满地的益母草在疯长,它们排成一小队,干干瘦瘦的,仰着花蕊儿,不知是打招呼,还是有些埋怨,或是不舍。人走过去时,总会扰乱它们。

我舍不得去采它们。瘦了的秋天,益母草已是果实满满,干瘦的身子支着果实,那些果实其实就是种子,身子一摇,它们落下来,一粒一粒地铺到地面上,运气好的时候,来年它们又活了过来。更多时候,它们就此结束了一次成长历程。

随同草籽以及草籽上的壳,益母草被一次次地切割,切成草药,与白茅根、车前子一起组成一个药方,让人们浮肿的身体得以解脱。记忆中的益母草有更多用处,活盘调经、利水消肿、清热解暑、清肝明目。

益母草晒在晒谷架子上,就是雨来了,也只得晒在那里,唯有这般,药效方可更浓郁。

通往大路的路口,益母草与其他草药一样,被铺开满地,散发着浓浓的水煮味道。从那些干瘦的药渣里,我嗅到了房屋里的炊烟,以及炊烟下面藏着的浅浅的药草味。在家乡,那些药渣子铺在路面上,来来往往的人们踩过它们,踩得越多,病人的病就好的越快。

益母草瘦弱的身子藏在冬日的阳光下面,无意间散落的种子又在繁衍,为了来年的绿叶与繁荣,它们仰着身子期待着。

里的母亲们都知道益母草,那是她们的草,是她们的另一种依靠。挂在窗台下面的益母草,母亲怎么就忘了,或是我们把它给忘了,在远山上的母亲,她还能采到益母草吗?

翻开《诗经》,读到蒹时,眼里就是那把益母草,那把挂在窗台下面在风里微微晃着的益母草,有益母草在,母亲就在。

母亲就好像一直还坐在窗台下面。

举着他那大大的空背篓帮我遮雨。我连忙止住眼泪,站起来,用手擦了擦眼睛,用蹩脚的借口说不小心摔倒,泥水进眼睛里了。父亲肯定什么都看到了,但他没说什么。把他的空背篓递给我顶着,自己去捡起泥水里散落的玉米,熟练地扎好口袋,把一口袋玉米甩上肩膀,转身对我说,“雨小点再回家吧,别在泥水里坐着”。父亲扛着玉米走了,我顶着背篓跟在他身后。

雨后,停下的工作继续进行,至于那怯懦的一幕没人提起。秋收的队伍扛着食物归巢的蚂蚁,需要有一只领头的蚂蚁。父亲就是我们这支小队伍里领头的那一个。他的背篓总是最大的,也是最重的,但他好像已经习惯,理所当然。父亲个子不大,身材也不魁梧,十五六岁时我就有了父亲的身高,但在他面前我却自觉矮了不止一头。我离成为大人还有不远的距离,就好比我不曾把背篓背出弯曲的凹痕,还不能像父亲那样无视风雨。我还是像以前一样,只有跟在父亲的身后,才会忘记背篓的重量。

我以为父亲是拧不弯的钢铁,却不曾留意他已人至中年,我以为母亲是勤劳的机器,却不曾留意她日见迟缓的形体。

一次寒假回家,村里许多人家正在用政府补贴的款项翻修房子,拆下来不用的旧瓦片却大多还是好的,父亲就和人家商量说拿来翻盖一下漏雨的棚圈。那几户人家答应了,但要自己去拉回来。几步路的距离请货车是不划算的,上下搬卸倒腾也很麻烦,用手推车的话,路又坑洼不平。父亲拍板,带头用背篓把瓦片背回来,我也跟着去了。本想着照父亲以前的干劲,两间棚圈需要的瓦不一会也就背完了,但结果却是父母和我整整背了一天。晚饭后,父亲说他浑身酸疼,很早就上床休息了,平日母亲爱看的电视剧在荧屏上播放着,她却靠在沙发上响起了鼾声,而我则同以前一样四肢酸软,瘫坐不起。

每当这时,我的脑海里就会闪现出那些旧背篓的样子,似乎那些夸张的凹痕正渐渐和父母背背的弧度重合。父母的脊背,已有村里老人们脊背的预兆了。我想终止那弧度的延伸,不愿背篓的深处深到没有个底限,而这需要我能够真正接下父母撑起一个家的“背篓”。也许,背和背篓的弧度是相互造就的,都是生命曾经蓬勃后的痕迹。生活的重量不是抛开而是接住,尽管它是一种生命意义上的消磨……